

墓碑、高牆與雞蛋：從薩摩亞的殖民血淚，反思歷史的權力迷思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序幕：穆利努烏的靜默證詞

南太平洋的微風夾雜著鹹澀的海水味，輕輕拂過薩摩亞首都阿皮亞（Apia）的穆利努烏半島（Mulinu'u Peninsula）。今天，筆者在這片遠離塵囂的島嶼上遊覽，跟隨導遊的腳步，走進了一處草木蓊鬱、略顯斑駁的歷史墓地。這裡的空氣彷彿比別處更為凝重，因為在同一片泥土之下，同時埋葬著遠征異地的德國軍人，以及數百名守護家園而犧牲的薩摩亞人。導遊站在墓碑前，眼神深邃，以此為切入點，為我們緩緩敘述起這段將薩摩亞命運徹底改寫的殖民歷史。

這座墓地的由來，本身就是一幅由硝煙與權力編織的歷史畫卷。筆者眼前所見的德國軍人墓區，其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在1888年至1889年間，西方列強為了爭奪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深度介入了薩摩亞的島內內戰。當時，德國軍艦悍然實施軍事干涉，與當地的薩摩亞部族發生了極為慘烈的武裝衝突。這群長眠於此的德國軍人，一部分便是在那場衝突中戰死的帝國海軍陸戰隊員；而另一部分，則是隨後在德屬薩摩亞殖民時期，因各種原因死於異鄉的軍官、行政官員及其家眷。

德意志的鷹爪：椰林與可可背後的高壓統治

隨著十九世紀末的列強角逐落下帷幕，1899年，英國、美國與德國簽署條約瓜分了這片群島。西薩摩亞正式淪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從1900年開始，開啟了為期十四年的德國殖民時期。德國首任總督威廉·索爾夫（Wilhelm Solf）在島上推行了極具效率卻充滿

剝削的現代化建設。德國人看中了薩摩亞肥沃的火山土壤與溫潤的氣候，將這裡視為帝國的「太平洋明珠」，並在此開墾大型的椰子與可可種植園。

然而，這些繁榮的經濟數據背後，全是以薩摩亞人的血汗為代價。為了擴大生產規模，德國殖民政府透過殖民法令控制土地與勞動制度，並大量引進外來勞工經營大型種植園。不僅如此，德國殖民者還試圖將薩摩亞延續千年的傳統土地所有權與社會文化結構「商品化」，企圖以歐洲的法律條文徹底規範並摧毀島民的傳統根基。薩摩亞人並未選擇順從。1908年，當地德高望重的酋長勞阿基（Lauaki Namulau'ulu）無法忍受殖民政府對傳統權力的蠶食，發起了名為 "Mau a Pule" 的非暴力反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主張和平抗命，但依然觸動了德國殖民者的敏感神經。德國政府隨即採取鐵腕手段，調來軍艦將勞阿基及其核心支持者全數逮捕，並流放到遙遠的馬里亞納群島。



紐西蘭的「接收」：大流感的深重災難

歷史的轉折往往充滿戲劇性，但對被殖民者而言，卻只是從一個深淵跳進另一個深淵。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戰火迅速蔓延至全球。大英帝國為了切斷德國在太平洋的通訊網絡，便要求紐西蘭出兵佔領德國位於薩摩亞的無線電報站。同月，紐西蘭派出遠征軍登陸阿皮亞。由於當時在島上的德國總督自知無力抵抗，並未進行任何軍事反擊，紐西蘭不費一兵一卒便順利「接收」了這片土地。一戰結束後，國際聯盟正式將西薩摩亞列為委任統治地（Mandate），由紐西蘭管理；二戰後再改為聯合國託管地。這段託管期從1914年一直延續到1962年。

然而，這場被部分歷史敘事美化為「解放」的接收，帶來的卻是比德國時期更為嚴酷且無情的統治。紐西蘭軍政府對薩摩亞採取了高高在上的軍事獨裁管理，對當地的文化習慣展現出極度的輕視。而兩國關係歷史上最慘重的一場災難，發生在1914年接收後不久的1918年。當時，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一艘載有流感病毒的紐西蘭商船「塔拉維拉號」（Talune）抵達阿皮亞港口。當地的紐西蘭行政官疏於職守，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基本的檢疫與隔離，便放行船員與乘客登岸。病毒隨即像野火般，在毫無免疫力的薩摩亞居民中蔓延。短短幾週內，高達五分之一、約佔總人口20%的八千五百多名薩摩亞人活活病死。無

數家庭滅門，村落絕嗣，哀鴻遍野。更令島民憤恨的是，鄰近的美屬薩摩亞因採取了嚴格的隔離措施而無一人染病，紐西蘭政府的自大與失職，在薩摩亞人心中埋下了無法磨滅的仇恨種子。

茂運動與黑色星期六：血染阿皮亞的獨立抗爭

大流感的悲劇徹底激發了薩摩亞人的民族自主意識。面對紐西蘭政府對傳統酋長權力的進一步打壓以及經濟上的不公，薩摩亞人團結一致，在1920年代中期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茂運動」（Mau Movement）。在薩摩亞語中，"Mau" 意味著「堅定」或「見證」，其核心口號是簡短卻震撼人心的「薩摩亞人的薩摩亞」。這是一場走在時代前列的、高度組織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支持者們身穿紫色拉瓦拉瓦（Lavalava，當地傳統腰布），以不納稅、不服從、罷工以及抵制進口貨的方式，表達對紐西蘭統治的抗議。

面對這種馬丁路德金、甘地式的和平抗爭，紐西蘭託管當局卻選擇了最激烈的暴力回應。1929年12月28日，歷史記下了悲慘的「黑色星期六」。當天，茂運動在阿皮亞街頭舉行了一場和平遊行，目的是迎接收監期滿釋放的同胞。現場氣氛雖然激昂，但參與者皆手無寸鐵。然而，維持秩序的紐西蘭憲兵因情緒緊張與傲慢，突然向遊行隊伍開槍，隨後甚至動用了機槍進行瘋狂掃射。子彈無情地穿透人群，現場頓時血流成河。在這場屠殺中，茂運動的領袖、愛國的最高酋長利奧洛菲三世（Tupua Tamasese Lealofi III）在試圖安撫群眾、呼籲平時中彈身亡。他在臨終前對守候在身旁的族人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的血是為薩摩亞而流。讓它流吧，保持和平，不要報復。」這份超越仇恨的胸懷，成為了薩摩亞爭取獨立的最高精神圖騰。經歷了無數次的流血與抗爭，薩摩亞人終於在1962年1月1日，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正式獨立。

遲到的正義：克拉克的正式道歉與和解

歷史的傷口雖然會結痂，但若沒有正視與認錯，底下的膿血便永遠不會消失。隨著薩摩亞獨立建國，紐西蘭國內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也開始反思這段長達數十年的黑暗託管史。當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這份歷史的虧欠終於迎來了官方的正式回應。

2002年6月4日，正值薩摩亞獨立四十週年的盛大慶典。時任紐西蘭總理的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她親自率領高規格的新西蘭官方代表團飛抵阿皮亞。在阿皮亞舉行的官方國宴上，克拉克站在薩摩亞國家元首以及無數當年茂運動志士的後代面前，發表了一份載入史冊的道歉聲明。她承認，紐西蘭早期的殖民統治因不當管理、疏忽以及缺乏對薩摩亞文化傳統的尊重，給這片土地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痛苦與家庭破碎。

這份遲到了幾十年的道歉，在現場引發了極大的情感震動，無數老人當場落淚。當時的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Tuilaepa Sailele Malielegaoi）代表全體國民接受了這份道歉。他展現了薩摩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中崇尚寬恕的博大胸懷，表示「寬恕是我們文化的基石」，並宣佈兩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就此翻過。這場正式道歉，成為了太平洋地區去殖民化歷史中的一個典範。自此，兩國關係逐漸恢復並昇華，雙方簽署了《友好條約》，在經濟、移民、體育及文化等層面建立了平等而緊密的夥伴關係。

反思：雞蛋與高牆的權力變奏曲

站在穆利努烏的墓地前，筆者的思緒不禁飄向了更深遠的哲學層面。一直以來，在談論國際政治與歷史壓迫時，我們都不自覺地陷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提出的所謂「雞蛋與高牆」的迷思。在普遍的認知中，世界被簡單地二分為強權（高牆）與弱者（雞蛋），而人們的同情心自然會毫無保留地投射在雞蛋身上。提起德國，現代人的腦海中總會自然聯想到它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強權，是一道凌虐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鋼鐵高牆。而在這道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高牆面前，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甚至是遠在太平洋的薩摩亞，似乎全都是瑟瑟發抖、值得同情的雞蛋。

然而，薩摩亞的歷史卻像一面明鏡，戳破了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歷史的殘酷真相在於：權力是相對的，身分是流動的。面對更弱小的雞蛋時，原本在強權面前扮演雞蛋的角色，轉過身來，也可以變成一道冰冷無情的高牆。

環顧世界殖民史，這樣的權力變奏曲屢見不鮮。在歐洲戰場上屢遭強鄰蹂躪的比利時，看似是不折不扣的雞蛋；然而其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卻在非洲剛果建立了個人的「剛果自由邦」，為了榨取橡膠利益，殘忍地砍下無數當地黑人的手腳，犯下了罄竹難書、幾近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同樣，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迅速攻陷、飽受摧殘的荷蘭，也是世人眼中的受害者；但荷蘭轉向亞洲時，卻化身為侵佔印尼數百年的殘酷殖民者。甚至在二戰結束、全球迎來去殖民化浪潮的集體趨勢下，荷蘭依然死死抓住印尼不放，不惜發動慘烈的殖民戰爭企圖繼續奴役這顆亞洲的雞蛋。

回到南太平洋的語境，紐西蘭在面對大英帝國或二戰的德國強權時，自然是處於弱勢的雞蛋；但在更為弱小、缺乏現代化武器與話語權的薩摩亞人面前，紐西蘭政府卻毫不猶豫地化身為一道無情且殘暴的高牆。無論是任由流感病毒吞噬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在阿皮亞街頭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紐西蘭殖民政府在薩摩亞展現出的殖民傲慢與暴力，反映了殖民統治常見的權力邏輯；在對待弱勢民族時，其行為與它所批判的帝國主義並非毫無相似之處。

這座埋葬著德軍與薩摩亞人的墓地，最終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人類歷史上的悲劇，往往不單純是「壞人」對「好人」的壓迫，而是「權力結構」對「人性」的腐蝕。當我們凝視歷史時，不能僅僅滿足於譴責某一個特定的強權，更需要警惕任何群體在掌握相對權力後所滋生的傲慢。紐西蘭2002年的正式道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展現了一個國家終於有勇氣承認自己曾經從「雞蛋」變成了「高牆」。走下這座歷史的舞台，願未來的世界能少一些盲目的權力崇拜，讓每一顆在陽光下生存的雞蛋，都能真正免於被高牆粉碎的恐懼。

2026年6月25日

原載於香港《有情無國界》

[更多資訊](#)